

# 第一章 南通现代化的启动

1895 年大生纱厂的筹创标志着南通现代化的正式启动。那么，南通现代化展开的舞台背景如何？它开始于怎样的一种历史基础？究竟是什么因素、通过何种途径向南通的输入造成了南通现代化启动的前提？新旧因素的组合在什么程度上达成了契合？这种组合，构筑了怎样的机制？这种机制又怎样保证了南通现代化的启动，并使之在较长的时期内得以持续？这些便是本章试图探索、回答的问题。

## 一、自然赋予与历史遗产

作为中国较早开始现代化的地区之一，南通的社会变迁与这一地区相当独特的自然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是以棉、盐为支柱的物产结构直接渊源于该地的地质、地貌特征和地理位置。

这一带位于长江三角洲持续沉降区的北部，介于海安——江都与崇明——无锡——宜兴两大断裂带之间。大约两千年以前还

是汪洋一片，长江在这里与大海交汇。

南北朝以降，在长江泥沙和海潮冲积的作用之下，沙嘴区、沿江平原和江中沙洲不断淤积，渐次扩展成今天水网密布、河道纵横的江北平原。由于多年的沉积物堆积，如皋以外的南通、海门、启东、崇明等县的土壤 60%以上为土质疏松的沙土和壤土，粘土比例一般在 40%上下，海门全境则无粘土存在。<sup>①</sup> 这种土质条件加之中纬度地带的北亚热带湿润性气候和丰富的光、热、水资源，使这里成为天然的棉花植作区。

东部滨海地带范公堤以东地区土壤盐分含量极高，又常遭海潮侵袭，是历史上著名的淮南盐场所在地。因此，成书于光绪二年（1876年）的《通州直隶州志》在卷四的“物产”项下讲到本地的外输货物时，列于前三位的依次为盐、棉和土布。

棉花的生产数额虽无从稽征，但有关通州棉花的外运在史载中却比比皆是。例如：“昔在明代通州棉花畅销徐、淮、山东，已用布袋每袋六十斤称为驮，驴马载运北去。”<sup>②</sup> 清乾隆时“闽粤人秋日抵通收花衣，巨舶千百，皆装布囊”。<sup>③</sup> 嘉庆时松江府有“邑贩自崇明、海门两沙来，碾去子卖于诸处”。<sup>④</sup> 当然通州棉花的外运毕竟只是少数，绝大部分是在本地转化成了著名的通州大布然后再贩卖到南北各地。

盐产丰富是近代以前通州成名的主要原因。清代中晚期，盐的生产在如皋、通州沿海分散在丰利、掘港、石港、金沙、吕四、余西、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民国 22 年版 第 1 编 第 33—34 页。

② 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 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印行 第 7 页。

③ 汪芸巢：《州乘一览》。

嘉庆《松江府志》 转引自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

余东 7 个盐场。史载光绪初年，仅这 7 个盐场的灶户就有 35616 户，灶丁近 11 万人，年产盐 168923 引。按每引 600 斤计算，计约 1 亿余斤。只就人口而言，盐民占到了全部人口的 17%。<sup>①</sup>鉴于盐、棉生产占去大量土地和适于稻作的粘土比例不大，该地稻米生产向来不敷自用，需要输入。但其他如麦类（元麦、小麦、大麦、裸麦等）和豆类、玉米等杂粮出产量又在江苏全省有重要地位，属于输出品的重要项目。<sup>②</sup>

棉花生产带来手工纺织业兴盛，通州土布又成了南北各地了解南通的媒介和纽带。

通州土布生产最晚应在明末清初。<sup>③</sup>其织造技术的源流则可远溯江南，大约是南汇、川沙沿海居民北上捕鱼时将耕织技术也一同带到了毗邻的崇明、海门。土布外运最初附着于棉花贩卖，也因为北方客商对棉袋功用的新发现而使品种增多、销量日增。用于制作棉袋的土布称作稀布。山东沿海客商在从通州向东北贩运棉花时，稀布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裱糊炕面、油篓和裁制船帆之类。因为北方冬季寒冷，家有土炕，大豆出产富足，豆油外销量大，大连、营口等沿海渔民经常出海捕捞，船帆对土布的需求难以满足，促使东北成为通州土布的主要市场。咸丰年间，稀布停运，粗密厚重的尺套开始盛行，用途也更有扩展。只是由于上海的开埠，通布北运的路线从旱路改成了由水路中转上海再北运营口。到同治元年（1862 年）尺套的布牌在上海已很有声誉，比如“鼎茂”、“天茂”、“天和”等等。<sup>④</sup>当然，运销东北只是通州土布的去路之一，适应别种需求的品种也有不少。光绪初年的《通州直隶州志》在“布”的名下就记

据光绪二年《通州直隶州志》及孙家山《苏北盐垦史初稿》第 23 页资料推算。

《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 1 编 第 100—102 页。

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 321 页。

同上书，第 29 页。

载着“紧厚耐著 有大布、土大布、上布、长尖诸名 其佳者曰沙布，曰家机布”。与土布有关的还有兴仁镇的巾带、余东场的苎布、芙蓉汗衫、芙蓉手巾等。东北以外，南京也有庄客赴通州采办土布。尤其在太平军占领苏、常，江南土布生产衰落之时，通海土布更是大行其市，从南京转运当涂、芜湖、浦口、蚌埠以至徐州，又与本地市场相连，更促成了通州土布的生产和需求。<sup>①</sup>总之，通州大布的显赫声誉所造成的南通地区手织业的发达，形成了天然优良的大生棉纱销售市场。

一方面是通、崇、海、如地区盐、棉、布生产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该地风气闭塞，人们的从商意识又很淡漠。明万历州志载：“通州风气，商不列肆，不赶集，不以妇女主店，不久客在外，仅于本土贸迁有无”。<sup>②</sup>到了清初，这种状况丝毫未变。康熙甲寅州志云：“通州人，性柔脆，不任劳苦。今适百里，非裹三日粮则废然返。”“在海门，市无倚门之妇，肆无当垆之女。里不朝歌，巷不夜游”，“不喜牵车服贾游于四方”。本地外输的棉布基本上全由山东、福建、广东、南京等外地客商集散，当地人只有极少数受这些客商雇佣代收棉布，并不担经营风险。

那么，这种矛盾的现象该作何解释呢？

光绪年间是海门、启东、南通沙地激涨的时期。对农民来说，这里地广人稀，土地易于得到，谋生相对容易。以海门为例，“厅属地广人稀，东面尤甚。滨海一带不惟人烟散疏，树亦罕见”。<sup>③</sup>再以嘉庆二十年（1815年）的人口密度比较，通州每平方公里为109.22人，在全省12个府州厅中位居第九，只有密度最大的苏州府

<sup>①</sup> 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166页。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万历《通州志》卷二。

朱正光：《江苏沿海图说·海门》光绪二十五年。

1073.21 人的约十分之一。<sup>①</sup> 一江之隔，人地关系的差异竟如此悬殊，难怪江南人口大量北迁。比如张骞的祖先即是为避战祸而由常熟土竹山迁居南通金沙场的。<sup>②</sup> 张家在此后几十年中由金沙而海门常乐、通州西亭的频繁迁徙也从侧面反映了通海地区地多人少的基本情况。通海土地的增加主要在沿海沿江，那里每过几年便会有沙洲新涨或滩涂延伸，形成为新的无主土地。据载，清末时有一崇明农户初来外沙垦荒，因所占区域过大，便在其亲戚携家前来探望时私赠沙田三万步为亲戚之子的压岁钱。<sup>③</sup> 由于土地较易获得，所以只要勤于耕织，一般农户的生活虽不富裕，但足够糊口。所谓通州人“素纯谨”、“安土乐业而重犯法、急公事”等史志记载都展现了一般农家安守本土的景象。

租佃制度在崇明、启东、海门最为流行，南通、如皋次之。原因是那里的土地关系“受沙地所有权惯例所支配，海中新涨之沙地为少数地主、胥吏所占有。大地主有五千亩八千亩以上者，中小地主也甚多”。<sup>④</sup> 据 1912 年资料<sup>⑤</sup>，南通县佃户占农户比例为 60%，海门 65%，如皋 59.2%，其中海门县世袭佃户又占总佃户数的 92.8%。<sup>⑥</sup> 租佃制度以内容分，主要有两种：崇划制和底面制，其中以崇划制流行较广。崇划制是永佃制的一种，由于土地归崇明地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73 页。

宋希尚：《张骞的生平》（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63 年印行），第 13 页。

沈时可编著：《海门启东县之佃租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之 60，（台湾：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第 30885 页。

李长傅：《江苏省地志》，上海中华书局 1936 年版，第 131 页。

关于地权关系，旧志书一般不列入主题，偶有提及也只是在“田赋”、“风俗”之中，后人难窥实情。因此，此处所用为民国记载。但因民承清制，承认土地私有且未加变动，所以后来的地权状况亦可反映清末的史实。

<sup>⑥</sup> 根据江苏省实业司：《江苏实业行政报告书》，民国 3 年印行，第 2 编，第 46—47 页。

主所有 承租者为当地农民 故谓崇划。方法是农民在承租土地时，先向地主缴纳“顶首”即押租取得永佃权，然后每年再听任地主议取年产的若干比例或由农民缴纳现金以代替实物。原则上农民不欠租或所欠租额未逾顶首以前，地主不得退佃。底面制使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地主拥有所有权即田底，佃户拥有使用权即田面 而且田底、田面均可自由转让 但无论如何转让 田底权所有者与田面权所有者的主佃关系不变。地主有收租权与完税义务，佃户有分成纳租 一般为 50% 的责任。根据这两种租佃制度 农民一般要将农产品的 40% 以上缴给地主，其通过佃种土地积累财富的愿望便只能化为泡影。

租佃制度盛行的结果是农民的普遍贫穷。1847 年在崇明、海门传教的魏道味神父在一封信中写道：“当你跨进这种赤贫的收容所式的屋子里面 你也不见有桌子、凳子 也没有任何家具或装饰；只有几只用以煮饭的陶罐；继而是一只大木柜，柜上面睡人，柜里面藏着全部家产，差不多这就是他们的一切财产。他们的饮食、衣着，总之在一切生活必需品上都反映出他们那种极贫穷的生活。”<sup>①</sup>

通海地区在区域政治、经济上的地位不高也是造成它风气闭塞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治上 同处江北的扬州位居运河交通要冲 唐以后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明清时又是两淮的盐运中心，其历史地位远非通州可比。

经济上，一水相隔的苏州早以富甲天下闻名于世 明清时期作为应天、江苏巡抚的治所更形显要，尤其是作为全国的丝织业中

转引自〔法〕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第 1 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14 页。

心以不足全省 10% 的耕地负担了 18% 的赋银，<sup>①</sup>表现出雄厚的经济实力，更为通州望尘莫及。鸦片战争以后，上海的开埠使通州变成了它的卫星城市之一，通州的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在江苏全省的地位实质上下降了。如皋以北至徐州府辖区素为江苏最贫穷的地方。上海开埠以前尚有山东客商由此运布北上，但上海一辟为口岸，这条陆路就被转口上海的水路运输所完全取代。

由南通入黄海去日本历史上有史可征，但随着江口沙洲的新涨和泥沙的淤塞，这条路也早被断送。至于江苏沿海，则因为浅滩绵亘，地势低平，浅沙入海凡 200 里，轮船根本无法靠近，并没有给苏北带来利益。长江为南通提供了东西往来的便利。但近代以前，鉴于舟楫落后，它的作用除了自然天堑以外并无益处。近代以后，汽船开航，江河海洋的价值凸现，又由于长江入海口的南移和崇明、南通港距上海太近以及此地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使南通的通商口岸价值大大降低。本世纪以来，长江入海口的舟楫之便实际上只限于横沙、铜沙与浦东半岛之间的南水道，而与南通、崇明岛紧靠的北水道和中水道“仅可通行沙船”。<sup>②</sup>历史地观照，不难发现，长江与近海带给南通的利益每每被人们过高估价。事实也是如此。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从崇明、通州、如皋等地一路而过或登岸领赠后即刻离去的史实，太平天国据守苏、常四年之久却不曾大举试攻一水之隔的江北地区，都与这里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王树槐：《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江苏省 1860—191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第 48 种，民国 73 年版，第 19 页）。

如成书于 769 年的《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述了鉴真和尚于公元 748 年第五次由扬州经狼山赴日的过程。圆仁和尚在《入唐求法巡礼记行》中讲到 838 年他随日本遣唐使来中国时在如东掘港附近登陆并受到当地官员与僧人善待的情形。

李长傅：《江苏省地志》第 41 页。

光绪二年本《通州直隶州志》卷七；民国《崇明县志》卷十七及同治《如皋县续志》有关内容。

综上所述，以自然赋予而论，南通的自然条件有利有弊。利在地处平原、土壤肥沃、气候适宜 因而物产丰饶且特色显著 尤其是因适于植棉而导致的手工纺织业的发达为日后机纱的盛销奠定了广阔的市场基础。弊在僻居半岛，江海之便因地貌原因难以发挥，北面经济落后使之地理优势大减。人文方面，租佃关系的盛行既造成了经济力量的脆弱，也强化了雇佣劳动的观念，对现代化的发动瑕瑜互见。这一切都表明，传统的南通地区除去自然赋予的优势和由此而来的手工纺织业的极度发达为日后机器纺织业提供了潜在市场以外，其现代化的基点与其他地方没有太多区别。

## 二、新因素的输入

大约从 1840 年开始 南通社会如同中国沿海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出现了某些新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机纱冲击的影响。

起初 民办信局在带信、汇款的业务以外 以走私方式从上海携带少量机纱在通海暗中销售。所销机纱以 10 支、12 支为多。10 支纱开始时只与南通本纱同价，12 支纱则纯粹滞销。经过一个时期的使用，机纱条干均匀、不易断头的优势逐渐显露，机户兴趣日浓 需求大增 价格随之上扬。从事机纱贩运的商家也越来越多 如葛锦成在南通西城门口的本纱摊子、刘汉泰的长泰纱庄、张秉钧的祥泰炳纱庄等。其他专业的商号也纷纷兼营机纱，比较有名的如早期的森昌、福润兴信局 后期的程玉岗皮货店、永昌林的钱庄等等。所销机纱的来源基本上局限于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华资纱厂生产的机纱只占很少份额。<sup>①</sup>数量上也逐年增加，据估计，1895 年通州

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 30—31 页。

纱庄每天销售的 12 支纱已达 20 件 即 800 小包。这在当时差不多相当于一个 1 万锭子纱厂的日产量了。”<sup>①</sup> 此后到大生开机的三四年间，土纱在市场上更受排挤。1897 年机纱在通海日销增至 80 箱。到 1899 年大生开车时，市面上机纱价格日益看涨，12 支纱趸销至 65 两，零售 67 两。<sup>②</sup>

机纱对通州形成冲击并不是一件孤立、偶发的事件。它的直接背景是 1850 年以后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地位的确立，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进口棉纱在价格和数量上竞争力的增强。19 世纪上半叶时，上海虽然已经成为长江流域和中国南北方沿海贸易的主要港口，但由于传统中国的城市以行政而非商业作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其商业潜能并未充分地发挥出来。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以近代贸易的观念首选上海作为要求开放的城市，短短十几年就使它拥有了取代广州成为全中国对内、对外贸易的“心脏”地位。<sup>③</sup> 这便使上海对近在咫尺的南通产生强力辐射成为可能。在上海早期的贸易货品中，丝、茶、鸦片和棉织品一直占据着压倒优势。而与南通传统的经济特征参较，棉织品很自然成了体现大都市辐射的最可能的载体。恰在此时，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发生的一连串重大事件极大地增强了洋纱排挤土纱的力度，使进口棉纱在 1872—1884 年的 13 年中价格下跌了三成，数

本书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9 页。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第 62 页。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9 页。

④ 1861 年美国内战爆发，此后持续 5 年的美棉饥荒迫使英国资本家改进设备、提高生产效率。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 1871 年伦敦到上海的海底电缆的接通都使英国资本家的获利机会大增。在 1873 年开始的长达 22 年的资本主义危机中，各国资本家更是长期地降低纱布市价、开辟纱布销路。这些都是洋纱竞争力提高的原因。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69—83 页。

量却增加了 5 倍有余。<sup>①</sup>可能性有了走向现实的最佳契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机纱迅速地渗入南通，成为导致一系列变迁的触媒。

从产业结构讲 首先是手纺业的衰落 即所谓“从此本纱产量一度减少 而价格亦降”。<sup>②</sup> 但大生开车前 限于机纱短缺 农民只用机纱作经纱 纬纱仍需手纺 手纺业所受打击尚不明显。到 1899 年大生纱厂开车、机纱供应稍多以后，机户有条件将经纱与纬纱全部改用机纱时，“土纱亦遂减少”。不过 机纱对手纺的冲击从总体上讲“风气之来 既不可遏”但其间也并非一帆风顺。机纱初来 有人就担心“通民向以纺织为生 若设纱厂 将尽夺织妇之利”。于是，“其时布商收布 凡见参用洋纱者必剔出不收”。<sup>③</sup> 其次 土布质量与数量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机纱的使用为土布由尺套发展为大尺布创造了条件。大尺布初为洋经本纬，规格上分别加宽放长了 20% 和 100%，市面价格“比尺套高出一倍多”。<sup>④</sup> 最有名的大尺布产自五福桥和二甲镇，在地域上以西路为多，流行品牌先后为裕大生、永大玉、天宝玉、同兴宏、世德昌等 均属关庄布系列。到 1905 年，大尺布发展臻于顶峰，单就北销数额已有 15 万件（600 万匹）之巨。<sup>⑤</sup> 第三 棉花生产大增 粮棉结构发生转变。土布外销的增加 “刺激了通海棉花的生产，而相应降低了粮豆的种植，由此又增加了芜湖、无锡以及里下河一带的粮食运售通海，同时更助长了通海土布的外销 辗转相因 互为促进”。<sup>⑥</sup>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72 页。

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 30 页。

江苏实业厅第三科编：《江苏省纺织业状况》商务印书馆民国 9 年版 附编《张总长季直经理大生纱厂十二年之历史》。

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 33 页。

同上。

⑥ 同上书 第 15 页。

再从培养工商业观念的角度考察，机纱的冲击影响尤著。首先，机纱并不只是有别于土纱的另一种棉纱，它是带着自身的哲学一起到来的。机纱比土纱条干均匀、线条更长、出布更多，且不易断头、易于手织。这些长处实质上显示了机器生产相对于手工生产的优势。机纱冲击土纱并逐渐取而代之更显示出大机器生产相对于手工劳动的强大冲击力。因此，十多年机纱在通海市场上的由无到有、由冷而热在思想观念上为大生纱厂的创设廓清了迷雾。这也许正是大生纱厂创办时未曾遭遇到如同 1872 年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开办继昌隆缫丝厂时当地手工缫丝业者群起捣毁机器的惨剧之原因。再者，它使南通地区的经商风气日见浓厚。南通居民原本“不久客在外”，但 19 世纪末，经商之风却陡然浓郁起来。其中绝大部分从事于土布贸易。比较著名的布庄除前述几家外，更有章源大、恒丰和、魏公和、升康、升和、恒记、仁源信、明记、毕正大、龚文记等。融通资金的钱庄此时也十分发达。由南通本地人创设的钱庄著名的有：永昌林、顺康、得记等。其他如木材业、烟业、纸业、洋药业也有很多人投资。<sup>①</sup>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通过这些商号和其他种种形式的商业行为造就、锻炼了一批商人。比较杰出的有：创立同兴宏名牌的恒记布庄经理沈燮均（字敬夫）、新地商人吴斗南、龚文记创业者龚文卿等。以海门厅岁贡沈敬夫为例，他早年与习仲屏、章维善等人合资组织了恒记布庄。布庄开业不久就创出了大牌布中最早的名牌同兴宏，而且持续不衰，成为大牌布四大名牌之一。1897 年沈应张謇之邀筹办大生纱厂，恒记布庄副理习仲屏继承布庄业务，于川港镇开办恒生福记布庄，使同兴宏布牌在清末民初几年中达到顶峰，最盛时年获利 13 万元。他的另一合伙人章维善在他走后才自立门

<sup>①</sup> 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 31、38—39 页。

户，于姜灶港建立章源大布庄，创出章源大布牌，也跻身于四大名牌之列。至于沈敬夫本人，则成为张謇筹办、经营大生系统企事业的最得力的助手，在大生纱厂创业阶段“赞助最力”、“最具肝胆”。<sup>①</sup> 张謇称赞他“诚忠介而勤勉，始终未负厂也”。<sup>②</sup> 再以初创大生纱厂的几人来说，刘桂馨（字一山）是川港镇刘正大布庄的经理，所创中牌刘正大布牌最多时年经营量达七八千件。<sup>③</sup> 陈维镛（字楚涛）也是本地花布商。此外，高清为南通木材商<sup>④</sup>，蒋锡绅是典当商。张謇之兄张警在回籍辅弟以前虽在江西任知县，但早年曾“一面助理家事，一面照料经商”，而且“从事商贾，常获效”。<sup>⑤</sup> 可见，张謇大生事业的建立与这批商人是分不开的。最后，机纱冲击是大生纱厂创办的源发动力之一。委任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的张之洞在给清政府的奏片中明确申述了这项任命的缘起：“近日洋纱内灌通海乡人利其匀细转相购买参织土布，每年销耗四十万金。若不亟就该处兴办纱厂，则民间此项漏厄无从而塞”。<sup>⑥</sup> 而接受任命的张謇也看到了洋纱倾销的危险性。他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需。花纱往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信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sup>⑦</sup> 所以，没有机纱冲击带来的种种变化，大生纱厂的开工即不可想象。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民国 19 年版，第 471 页。

同上书，第 472 页。

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 58 页。

《高君立卿墓志》，《张季子九录·文录》卷十四（以下简《称九录·×录》）。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 57 页。

⑥ 《南通实业教育慈善风景》第 8 页。

⑦ 《通州兴办实业章程》翰墨林印书局编印，上，《大生纱厂》第 9 页。

⑧ 《厂约》，《九录·实业录》卷一。

总之 传统的南通社会虽避免了西方炮舰的入侵 却被机纱打开了缺口。

关于南通地区新因素的输入，还有一种表面看有悖常理的社会现象，即曾在西方社会激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督教的传播在这里虽一度异常活跃，却不曾给整个社会观念的变革造成大的冲击。这种结果虽然令人诧异，但似乎理应给予记叙与分析。

早在 17 世纪下半叶，基督教便已传入崇明、海门，使该地成为我国受基督教影响较早的地区之一。18 世纪禁教时期，这里的传教活动自然中绝。19 世纪初，个别中国神父着手恢复基督教，但时断时续，收效甚微。直到 1841 年，意大利人罗伯济署理南京主教区教务以后，崇明的教务工作才被提上议事日程。<sup>①</sup>1845 年，年轻的葛必达神父只身前往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崇明岛进行传教，从此开始了天主教（Catholic）耶稣会（Jesuit）对崇明、海门的强力控制，并持续到 20 世纪初。光绪中期，新教（Protestant）、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男女青年会势力在南通也有渗透，但力量远不如天主教耶稣会。截至 1908 年的统计表明，天主教在通州府拥有教堂 32 座、义学 5 所，在海门教堂 4 座。其中各县府厅的总教堂分别设在崇明的堡镇、海门的茅家镇和通州府城的东门。而新教在这里的教堂总数只不过 6 座。<sup>②</sup>如皋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建于 1868 年。由原海门本堂的卜理奥神父通过某官员暗中购房，竖起十字架后才向知县报告获准。<sup>③</sup>耶稣会从 1845 年至 1880

据《江苏通志稿，外交志》。

王清穆：《崇明县志》，民国 13 年本卷四。此书《地理志·风俗》中称：“道光末天主教徒来，建教堂。光绪中基督教徒继至，于是始有天主、耶稣教。”

《江苏教堂册》，见《文献丛编》第 23—27 辑，转引自王树槐《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第 48 种，民国 73 年版。

① 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第 2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27 页。

年的 35 年中先后派往崇明、海门两个总铎区的神父有 55 人<sup>①</sup>，巡视的主教和暂时代理的神父尚不计在内。耶稣会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教徒，扩大教会队伍，一切安排均围绕这一中心。在他们的活动项目中，育婴、付洗婴孩、为临终者作终缚、劝化教外人是直接扩大教徒的举措，坚振和主教巡视、坐堂说法则属于间接行动，尤其以付洗婴孩数量最大。如葛必达神父在刚到崇明的一年中，就为 1400 名教外婴孩付了洗礼，而同期吸收的成人教友只不过 320 名，劝化教外人也约 300 名左右。<sup>②</sup>付洗的教外婴孩基本上是弃婴或者由教友买来的其生身父母意欲抛弃的婴儿，因此付洗后即刻

他们分别是：崇明总铎区，1846 年为葛必达，1847 年葛必达、魏道味，1848 年葛必达，1849 年葛必达、费尔伯，1850 年为文思、倪也堂、魏道味，1851 年与 1852 年魏道味、费都尔，1853 年魏道味、马理师，1854 年魏道味、禄理格，1854—1856 年禄理格、平乃公，1856—1857 年禄理格、平乃公、卫德宣，1857—1858 年平乃公、卫德宣、赵神父，1858—1859 年平乃公、赵神父，1859—1860 年平乃公、艾尔梅，1860—1861 年平乃公，1861—1862 年卜理奥、石可桢、赵神父，1862—1863 年卜理奥、安于仁、赵神父，1863—1864 年卜理奥、赵神父、顾神父，1864—1865 年卜理奥、步天衢，1865—1866 年禄理格、步天衢，1866—1867 年富守和、顾颢，1867—1868 年禄理格、葛宗默，1868—1869 年计雅三、葛宗默，1871—1872 年富守和、姚继白，1872—1873 年富守和、卫德宣，1873—1874 年富守和、罗以礼，1874—1875 年罗以礼、施方礼，1875—1876 年白备德、沈则信、唐际虞，1876—1877 年白备德、罗以礼、唐际虞，1877—1878 年白备德、沈则信、卫德宣、黄斐理，1878—1879 年严思愠、卫德宣、顾颢、黄斐理。海门总铎区，1847—1848 年为魏道味，1849 年为魏道味、年文思、梅德尔，1850 年魏道味、梅德尔、柏理师，1850 年魏道味、梅德尔、倪也堂，1851 年倪也堂，1852、1853 年李秀芳，1854 年李秀芳、雷通骏、卫德宣，1858—1862 年雷通骏、卫德宣，1862—1864 年雷通骏、兰廷玉，1865—1866 年卜理奥、黄伯禄、富守和，1866—1867 年卜理奥、禄理格、黄伯禄，1867—1868 年卜理奥、范世熙、黄伯禄，1868—1869 年卜理奥、夏祝三、黄伯禄，1869—1870 年卜理奥、夏祝三、陈显文，1870—1871 年卜理奥、卫德宣、沈神父，1871—1872 年葛宗默、沈则信，1872—1873 年葛宗默、罗以礼、沈则信、李儒良，1873—1874 年葛宗默、戴尔第、李儒良，1874—1875 年南志恒、费赖之，1875—1876 年南志恒、费赖之、罗以礼、顾颢，1876—1877 年南志恒、彭安多、顾颢，1878—1879 年罗以礼、陈显文、张星伯。参见史式微上引书，第 1 卷，第 242、369 页，第 2 卷，第 123、330 页。

<sup>②</sup> 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第 1 卷，第 141 页。

死去者占绝大多数。少数侥幸存活者往往由贞女们自愿抚养。这便是育婴堂、孤儿院的前身。当然，育婴堂中艰苦的生活条件也是儿童夭折的重要原因。至于他们所吸收的成人教友，情形异常复杂，尤以吃教者居多。崇明本堂卜理奥神父曾为此大发感慨：“噢！对于只追求金钱和活命的中国人来说，圣教会的相信天主、仰望天主、热爱天主中心思想，是多么不可理解啊！每天有各种各样的教外人，怀着最可笑、最不相称的动机涌来我处：有的看到我们行慈善事业，因而要求进教；有的是为了可以不劳动而有穿、有住、有吃，或认为至少可以分享一些哀矜而要求进教；有的人犯了法，也要求进教，为的是希望在打官司时，得到救援与解脱。”<sup>①</sup>在教友中甚至发生过同教乡亲私自捆绑教中惯偷，然后点火烧死的惨剧。<sup>②</sup>那些虔诚地笃信天主的男女教友其宗教知识和宗教素养也差得惊人。葛必达神父 1845 年在寄自崇明的一封信中写道：“教友们保存着信仰，可是宗教教养太少了。”<sup>③</sup>曾长期在崇明、海门、通州一带传教的魏道味神父在写给他在法国修道的姐姐的一封信中也提到：“这些女子绝大多数是不识字的，也就是说，既不会读也不会写。她们在要理问答上或一般经本上能辨别出几个字，那也是由于她们无数次地翻来覆去地读、一句句地背，把这些笔划七横八竖的中国字硬嵌硬印在脑子里的结果。但是当这些字在另一本经书上出现时，这些女‘才子’就再也不认识了，她们又得从头学起。其次，即使某些女孩子分别识得不少单字，并能流利地通读一些教会经本，但由于这些经本编写的词句不是通常的语言，因此她们也很少能真正了解其中意义。”<sup>④</sup>她们的基督

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第 2 卷，第 122—123 页。

② 同上书，第 1 卷，第 368 页。

同上书，第 28 页。

同上书，第 246—247 页。

教知识大多来源于宗教礼仪的熏陶和传教士们半通不通的汉语解释。

新教在南通的传播几乎与大生纱厂的创办同时。传教士来自美国 经费相对充足。当他们最初在南通开办学堂、修建教堂、创办医院时“每多隔阂之处”。<sup>①</sup> 随着受益民众的增多，南通百姓与新教不仅“民教相安”而且对新教关注日增。到 1925 年左右 基督教的重要节日已在百姓中家喻户晓，新教势力也超越了耶稣会的影响。但那已是很晚的事了。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 资本主义精神发端于新教伦理。而在南通、海门、崇明一带 现代化启动时期 天主教中最保守的耶稣会势力占据着基督教的主导地位。这对于南通地方来说，不能不是一场悲剧。在这里，基督教的传播基本上局限于下层贫苦百姓，很难获得士绅们的同情与理解。王清穆甚至在 1924 年纂修《崇明县志》时也抱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基督教义不仅“非缙绅先生所愿闻”而且信奉者“皆贫无聊赖不齿乡里 不得不遁逃空门”者。<sup>②</sup> 同时，由于这一带地方相对于江南贫穷、落后，特别是教育水平的低下，传教之初传布先进的科学知识和西方文明并非主要任务，且基本上无暇顾及。当然，频繁、严格的宗教礼仪活动对于经常参与的教友而言，能够培养他们的时间观念、刺激他们追求新奇的冲动 但作用却微乎其微。<sup>③</sup>

佚名：《二十年来之南通》下 第 116—118 页。

王清穆：《崇明县志》卷四，《地理志·风俗》民国 13 年本。

笔者认为，教案发生的频率、轻重、开始与结束的早晚等总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地方百姓接受新异思想的能力和追求新奇的冲动力度的强弱，但可靠程度却大可置疑。因为教案的起因十分复杂，与传教士及教民的素质高下，瞬间行为等密切相关，通过教案发展趋势很难反映人民接受新思想的程度。故本书并不以分析教案作为考察新因素输入多少的依据。

### 三、张謇的思想转变

现代化的条件之一是具有新思想的领袖人物的出现。张謇在 19 世纪末最后几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使他具备了成为现代化领袖人物的资格，其标志是他对农工商产业关系的全新认识、实践和某些个性特征的养成。

写于 1895 年底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和此后一两年中形成的《商会议》、《农会议》、《农工商标本急策》、《请兴农会奏》<sup>①</sup> 透视出张謇对农工商关系的新看法：“世人皆言外洋人以商务立国 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在他看来，工业居农工商实业之首；农业固然为人民生存之必需，但“中国生齿繁而遗利 若仅恃农业一端断难养赡”所以，“非此指新式工业——引者加 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 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商业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农工之去路”。值得注意的是 在《请兴农会奏》中 他的主张似乎有悖于以上认识 比如讲“立国之本不在商也 在乎工与农 而农尤要”后来甚至提出过“民生之业 农为本”“工次之”这样的论调。<sup>②</sup> 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 这些提法中对农业的强调是从为工业提供原料的角度出发的，即所谓“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农业“殖生货”而工业“资生以成熟”农业在本质上附属、服务于工业，只不过因是工业的基础而呼之为“本”而已。这里 工业主导、农商辅之的观点与传统的农业为本、工商辅助的看法已有霄壤之别。当然，“以工立国”、“工商为先”的认识在中

<sup>①</sup> 《九录·实业录》卷一。

<sup>②</sup> 《通知海棉业公会棉产统计报告书序》，《九录·实业录》卷六。